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八二期 ——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2b）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一）	周孜仁
【研究报告】“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	陈东林
【痛定思痛】“文化大革命”拾零	韦君宜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一）

• 周孜仁 •

一，文章缘起

人家都说我是《815战报》的主编。

文革动乱，耿耿十年，群众组织的小报多如恒河沙数。从没听说谁给谁封过什么主编。我也如此。之所以认可我是该报主编，是因为这份小报曾闯了一个大祸，大到已忤达圣聪，惹怒龙颜。上峰追查太紧了，谁都抵挡不住，总得有人出来承担一下罪责吧。这样，我就认了。本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确实在该报负责。说我主编也不冤。

时间是1967年秋天，四川省两大派为打刘张和保刘张闹得冤冤不解。刘张是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简称。其时刘任四川省革委筹备小组副组长而张为政工组负责人，被中央文革捧红了半边天的著名左派。保刘张派说：“张梁刘张好干部，敌人反对我拥护。”张是指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革筹组组长；梁，指司令员、革筹组副组长梁兴初。梁是坚决的反刘张派。张、梁当然是在口号中被陪绑。反刘张派则说：“张梁蓝白好干部，刘张两挺烂萝卜。”蓝、白是指坚决支持反刘张的54军副政委及副军长蓝亦农、白斌。11月初，四川省反刘张派主力：重

庆815、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南充“指挥部”在重庆大学召开联系会，交换意见并制定作战方略。笔者忝列该会，并在会后写了一篇文章，于是便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篇忤达圣聪、惹怒龙颜的“大毒草”，题曰：《大局已定，815必胜》。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67年7、8月，江青一伙在全国导演的反军高潮，以中央“9.5命令”为终结而全面受挫，只好将因武汉“720事件”而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关峰、林杰三人抛出来作替罪羊。其时，这股反军潮对四川地区影响尤为深重，死伤动辄成百上千、动用除飞机之外所有火器的重庆大武斗及武装支泸，万县、云阳等地的武斗，都发生在这段时间。王、关、林的意外倒台对于一直对54军心怀芥蒂的刘张二人无疑是当头棒喝。对于紧跟刘张的四川826派和重庆反到底派，自然也是一份凶信。而一贯以正确路线自居的815派，自然认为自己又正确了一回。胜券在握，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了，于是就欢呼雀跃，开会游行。而以文斗为业的重庆大学《815战报》，当然也跃跃欲试，要来点大块文章了。这样，我和编辑部另外三个同学，画了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挂在墙上，然后像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用铅笔在上面画了好些红圈蓝圈红箭头蓝箭头，似乎只要再小试锋芒，全中国就都是咱们的了。于是凭空相象，开始舞文弄墨。文章由四人分头执笔，写好后由我润色定稿。感觉不错，想增加一点份量，便和当时815大派的报纸《山城战报》商量，以两报编辑部的名义联合发表。报纸出版，反响果然巨大。听说当天就有学生夤夜欢呼，称该文章是“投向刘张独立王国的一颗重磅炸弹”，“敲响了刘张独立王国的丧钟”云云。游行我没看见。但标语我是看见了。接下来，几乎全川815派和红成派的小报都先后转载，有一种齐步走的感觉：效果大大超出原来想象。《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重庆石油学校老师）事后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很高兴地说：真没想到一文既出，洛阳纸贵呀！文章有个副标题，叫：“一评四川时局”。有一评当然得有二评、有三评、有四评……就像当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九评”，把苏修头目赫鲁晓夫乾净利落评下了台。当时我们已经走火入魔，也想几篇文章就把刘张评成“历史的狗屎堆”。事后，《山城战报》就把我“关”在他们报社让我写“二评”和“三评”。写“四评”时我去海南岛出差，由四川外语学院一个中文老师接着写。该文对我印象最深是其中有一段写反到底派头目黄廉在潘家坪宾馆结婚。其中一句话是这样的：“新郎也斜着醉意阑珊的眼”对新娘如何如何。我当时不认识“乜”字，还查了一下字典，还有，按当时说法，这段描写有点黄色。所以我记得。

谁知道黄粱未熟，好梦已惊。1968年3月15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周恩来以下全体首长到会。现在我已找不到那次讲话的原文。但我记得绝对清楚，在这个有名的“315指示”中，周传达说：《大局已定，815必胜》，这篇文章，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大局已定，815必胜》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这一句话，后来马上被演化为：周XX（指笔者）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竿、反动文人，必须抓起来。这些话是张西挺在同年7月29日和8月14日在四川省大学生分配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大字报上的说法就更多了。

于是，那时就有了全国五大毒草的说法。这五大毒草分别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广西大学的《今日哥达纲领》、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及《我们的纲领》、重庆的《大局已定，815必胜》。我记得《四》文是被江青点的名，《今》文是被康生点的名，湖南两文被中央谁点名记不起了，而《8》文被点名的“规格”最高。这样，我在劫难逃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发配云南边疆所受到折腾也够充份了。窃以为，我力图远离政治，靠一个工科学生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兢兢业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事实上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可红卫兵小报的生活经历却总像阴影一样笼罩头顶，挥之不去。直到1984年，我已经在一个公用事业公司担任技术科长、总工办主任，某天，一位远在炸药厂担任总工程师

的同学黄肇炎（也曾是《815战报》的编辑）突然从山区跑来昆明，（他们厂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山的山顶），他告诉我说：“母校来人啦！来调查你、还有战报的人员情况，你可小心！”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心境非常平静，我说：反正国民党的战犯全都特赦了，国家总需要一些反面教员吧。让他们来，我认了。

后来，重庆大学的外调人员果然来了。我非常清楚，其时，很多同学都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而且都需要过“文革表现”这一关，所以——我现在承认——当时我恶作剧地嘲弄了一番远道而来的外调人员之后，除了为“亲者讳”，对他们想了解的同学一律评功摆好，此外，我给他们提供的，全是毫无用处的“垃圾信息”和伪证。

现在，又十多年过去了，《815战报》和我共过事的、在重庆文革中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学都已经年迈，有些已经作古。该当官的也已当到头了。该退休的也已退下来了。他们都已经走完或者即将走完自己的仕途，把这些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应该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了，我想。写下后面的文字，我只有一个念头：真实地，负责地，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

现在我开始写。

二，加盟

作为重庆815派的领头羊，重大815战斗团的机关报《815战报》，它的出版发行至少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战斗团本身要有足够的政治、组织基础；二是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如经费、纸张，还有印刷厂等。第一个条件，应该说1966年8月15日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已经具备。具体说，相对于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815战斗团一开始就具备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原因见拙文《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815运动》）。第二个条件则是该年11月19日才具备的。10月8日至2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清算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三司为首的左派在社会上与之呼应，便提出了所谓物质条件“必须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等口号，并开始对本单位的广播器材、交通工具、印刷手段等等，实行打砸抢。重大815的学生如法炮制，在11月19日这天上午10点正，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实施突然袭击，包围了校长室、电话总机房、广播站，当然还有印刷厂等等，没有经过太多争斗，很快便夺取成功。

在此之前，815实在是很可怜的。传单全是用毛边纸。油印机也多是自己制造：用几根木条钉一个框子，再蒙上一层纱网，用胶皮将油墨一刮就成了。这种传单质量差是差，可本身就极具宣传效果。人生而心多测隐。尤其莘莘市民，尤其从不惹事生非的“和平老太婆”，最为同情弱者。一看见可怜巴巴的毛边纸，就恨不得马上高呼815好得很。1966年十一国庆，重大815故意把自制的油印木框作为道具参加游行，当场赢得不少同情之泪。而保守派的道林纸传单，美则美矣，市民一看就反感，更何况每次进城开会他们都坐车，还派发点心，这就更难让人接受了。重庆地区过中秋喜吃麻饼，而麻饼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实属高消费美味，因此听说“思想兵”派发的点心是麻饼，市民便义愤填膺，将保守派一律蔑称为“麻子兵”，该提法在重庆乃至四川一直广为流传。我姐姐的大女儿当时11岁，就读于重庆南岸区雷锋小学，报名参加“815小闯将”组织，口试便有这样一题：问，“思想兵”开会吃不吃麻饼？如果回答：吃。那行！否则有保皇倾向。“思想兵”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简称。

其时，重庆流传有所谓革命童谣若干，其一如下：

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铁竿保皇，铺盖两床。

该“童谣”很可能系大人编造，但确能反应当时市民心理。此外还有一副对联反映上述事实：

想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
看今朝，造反派毛边加油印打败保皇派。

把广播器材、交通工具、印刷手段等等夺过来情况当然不一样了，但困难仍然不少，比如印刷，重大有个印刷厂，原来就印些讲义教材什么的，共有四台四开机、一台石印机，还有几台圆盘机。厂里的工人均对共产党感情很深或者深怕别人认为不深者，所以运动一来，理所当然都参加了保守派。造反派把权一夺，大家全都名正言顺回家休息了。只剩下一个老头（姓名已经忘记）没走，好像是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怕造反派整他，就留下来了，自然成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权威。字架密密麻麻，铅字成千上万，要拣出来，拼成文章，还要印成报纸，光他一根独苗苗当然不成。因此就组织了同学若干，分头在字架前站好，一人盯看几个字架，统一由一人朗读文章，每个字每个标点逐一念来，铅字找好，再由一人专门收集，收集好了再交“独苗苗”排版。我记得老头很有文化，每拼好一篇文章，打出小样，他都要认真阅读，并和我们交换意见。

《8 1 5 战报》最初的发起人是动力系五年级同学刘福。刘福，四川中江人，好书画，热心公益活动。二年级时担任级会主席，曾举办过一次画展。其时，笔者在校业余文工团美术队任队长，所以他一张大红请帖把我请去了“光临指导”。画展实在算不得什么画展，那些书那些画，全被他们用浆糊直接贴在墙壁上，贴得满满宕宕，书画水平当然更不能恭维。但就因此事，我认识了他。刘后来官至贵州省瓮福磷矿党委书记。短短几年，国家对该矿山的投资动辄就几十、上百个亿，足见该矿规格不低，刘的官位也不低。这是同学们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一贯为人和气，一说话就嘻嘻地笑，笑得十分认真，由于太认真，嘴里总像在不断吹气，作可爱的希希声，让人总觉得欠着他什么似的。

8 1 5 战斗团成立后，他在北京办事处当头儿。后来办事处撤消，学校已经夺权，他就回来筹办小报。我写文章在学校已大有名气，他自然要我加盟。开始我一直推辞，经不起他百般笑容，最后一刻同意了。我说这样吧：你负责，我做些具体的文字工作。出了问题由你顶着。他同意了。

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小将”一个个牛气冲天，动辄就“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我这样的胆大妄为之徒，当时偏偏出此低调不祥之语，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的原因。

虽然我曾是8 1 5事件的主要发起人，而且在事件第二天便作为五人代表秘密去了北京告状，（五人之一的周家喻后来成为名满天下的8 1 5一号人物；另一位：吴庆举，也一直是8 1 5的主要“勤务员”。我和另二人：师专造反派的一号唐宗明、重大文工团的王太康先行出发，周、吴二人因故未能成行）并于8月20日和21日两次受到当时中国第四号人物陶铸的接见，进了中南海，可恰恰因为那时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北京红卫兵实施“红色恐怖”的种种惨状，我一下子就失了底气。告状回校，马上激流勇退，回美术队战斗组当起一般成员了。激流勇退的原因是我自觉家庭出身十分可疑。所谓可疑，是对父亲解放前夕到底干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干的？我浑然不知。所以大学时代，每次面对登记表我准发愁，我搞不清楚我父亲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我该是继承他革命阶级的优秀品质？还是该和他的反动本性划清界限？我们兄弟姐妹十个，每人填写的家庭成份都不一样。大姐工作最早，解放初，她填的是：民族资本家。后来参加工作的，随着国家阶级政策风声日紧，成份也就依次递减。有的填：工商；接下来：

商人；再下来：小商；再下：城市贫民。我态居中庸，填的是倒数第二种。填是填了，心里却一直不踏实。北京“红八月”，到处杀气腾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纳粹党徒驱赶迫害忧太人一样迫害得鲜血淋淋，看见这，我不自觉担心起自己的命运来。事实是，后来我在成都的老家果然被抄，年迈的父母被斗得死去活来。古往今来，哲学家们穷经皓首，都喜欢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十多年的革命教育，曾让我坚信自己是未来的英雄，而1966年8月的北京之行，却将我恐惧万端地把自己迷失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什么人？回到重庆，我就开始溜号。只是刘福相邀太切，碍于情面，我勉强答应，再作冯妇了。

我曾查阅了1966年秋天的全部日记，认真回忆了当时每一个思维细节：在我的疯狂的宗教狂热中间，似乎还没有觉察有任何个人的欲念。只是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欲和献身狂。同时，家庭出生的先天不足所带来的自卑感，一方面让我必须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激进，一方面又会在每一关键时刻让我裹足不前。想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了。1966年11月13日，我回到成都被抄的狼籍不堪的老家。空荡荡的屋里已一无所有，连地板都全部撬光。冰凉的泥地上就扔了几捆稻草，年过七旬的父母亲蜷在杂乱的草堆中。无处藏身的老鼠也在稻草中穿来穿去。灶台被彻底夷平，爸爸妈妈只能用三块砖头围起来，像开野炊一样做饭。面对如此凄紧的场面，我记得我公然表现得十分超然。我以为我没有因他们的过失影响我而责东怪西，这就非常宽宏大度了。我将重庆姐姐委托我稍回的一床旧棉被交给他们便匆匆离去。以后几天，我都是到外地学生接待站过的夜。我查阅了当天日记，上面只有这样短短一行：

“家被抄了，很冷落，也没什么了不起。大革命嘛，不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怎么行呢？”

几十年后，当父母的坟头早已衰草离离，每次回乡扫墓，跪倒在潮湿的泥土和抖索的落叶上，我都回想起1966年11月13日的日记，那一刻我总会诅咒自己的卑鄙和丑陋。

除了刘福和我，编辑部还有一位张姓同学，动力系学生，原在市文联住点，眼镜儿，也和刘福一样，永远对人微笑着。动力系四年级有位生得很体面的女生，吴秋仙，原先在演出队帮忙，后来退出，说没事情好干，也来了编辑部。张、吴二人没有干多久就离开了。战报最兴旺时，编辑多达十几人，但开始，就是这么拼拼凑凑起家的。这是1966年11月底的事。（未完待续）

~~~~~

## 【研究报告】

###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

• 陈东林 •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据统计，196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出版的报纸（专区级以上）由343种下降为43种，杂志由790种下降为27种。（1）如果除去被夺权后在动乱中中断断续续出版、内容与《人民日报》基本相同的29省市自治区机关报，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其他行业和部门报纸，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文革”群众组织自发创办报刊，遍及全国，其总量至今无法准确统计，据我个人估算，大约在10000种以上，又可谓“满街红绿走旌旗”。

由于“文革”时期档案部门遭到严重冲击，使得今天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十分匮乏，而这些“文革”组织报刊就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历史现象和思潮的重要资料作用。从“文革”开始以来，境外研究中共党史机构就广泛使用了这些档案，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著作。无庸讳言，由于这些报纸带有明显的时代错误色彩，因此“文革”后在国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一部份被销毁。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国内也有些研究者和收藏者开始注意进行有关的研究和收集工作。但是，这些研究还在初级阶段，国内出版的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报刊史及党史史料学著作，尚无专门论述。

#### ◇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起与衰亡

首先，要给“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下一个定义。根据我的研究，可以提出这样的几个标准：一、从时间上看，应该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出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使“文革”群众组织公开化以后创刊的。“文革”前已经存在的各种机关团体报刊（取得登记资格的），无论其以后是否被夺权，一般不应包括在内（如《羊城晚报》改名《红卫报》）。但一些由“文革”群众组织独占、并改换名称的报刊可以视为阶段性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如“新北大公社”时期的《新北大》）。二、从主办者看，必须是由“文革”群众组织而非合法机关团体主办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虽然有不少是由“文革”群众组织夺权产生，但是经上级单位批准后已不属于群众组织，并且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已被载入宪法成为国家地方权力机构，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机关报不应属此类（如北京市工代会办的《北京工人》）。三、从出版看，必须是铅印、署明主办者、有出版期数、公开发行（一般均出售），否则应视为传单和内部资料。

根据上述标准的个人调查，最早创刊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2）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等活动，由于采取了严重的打砸抢行动，一个多月后即遭到解散，只出版了十几期。“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为高干子女，因不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被斥为“保皇派”，报纸出了二十几期即停刊。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崛起，其报刊代表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的《井冈山》，加上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新北大》（8月22日由原北大校刊改名），合称为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造反组织报纸。这些报纸的特点是，因为组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在北京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发表的社论往往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态度，有指导运动的作用。报纸的出版、印刷、发行比较正规，前期还通过邮局订阅，存在时间也很长，一般都延续到1969年。

1967年1月，由《文汇报》被夺权开始的上海“一月风暴”，使报纸成为各群众组织夺权的主要对象。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北京、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发出的“紧急呼吁”，要求“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出出版大权”。此后，各地“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办达到高潮。据目前不完全统计，种数最多的地区有：北京900多种，上海3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都在300种以上，其多少基本上是取决于人口密度和文化地位。不仅跨行业的“文革”群众组织办，一派组织办有多种，甚至连一个小学的几个人组成的“文革”群众组织也能办报。例如1967年周恩来曾经询问四川重庆的解放军支左负责人，重庆“反到底”派有多少报纸？回答是有30多种。（3）从报纸特色看，西藏地区虽然只有十几种，但却办有独具特色的藏文版《红色造反者》（据说是造反派夺了藏文版《西藏日报》权后出版的）。此外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还办有中英、中俄文版对照的《教育革命》等报刊。从办报人的职业看，由于造反浪潮涉及各个阶层，各色人

物都有，以学生、教师、干部居多，工人其次，农民再次。一些军事院校“文革”组织也以军人身份办报。尤其有趣的是，还出现了聋哑人办的《聋人风暴》，甚至从监狱“平反”出来的囚犯也办有《红囚徒》，其混乱状况可见一端。

当时“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大批判”，连篇累牍地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尤其是1967年8月康生主持下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之后，各省市区的报刊公开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中的“走资派”，本来就肆意直接点名的“文革”组织报刊更是污蔑诽谤，人身攻击，无所不用。这一类资料一般说来对历史研究价值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罪行”形式刊登的言论，如果不属捏造歪曲，去除涂抹的污浊后，今天看来仍不乏闪烁真理光辉之处。如邓小平“不管黑猫、黄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最早广为人知，就是通过这种形式。

二是刊登内部“首长讲话”和文件。除了刊登本派组织的“决定”、“通知”等文件外，许多著名“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为了显示自己得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几乎都设有“动态组”、“情报组”，派出记者尾随中央文革成员参加活动，抢先发表他们得到的“首长讲话”。中央文革小组有些新的部署，或是某些不便公开的策划，也常常有意通过“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制造舆论。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认为，从许多报纸的引语和文章重复来看，“估计这些材料是由隶属文革小组的某个专门机构预先准备好提供给红卫兵的”。在一定程度上揣测到了当时的历史内幕。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许多无所适从的军队支左负责人也往往从“文革”组织报刊刊登的讲话中摸索政治动向。这一部份内容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价值很大。因为那些“首长”往往执掌生杀大权，一句话即可结束一个人的政治乃至肉体生命，成为冤假错案的起因；或是将一个“文革”组织定为“革命”、“反革命”，影响整个地区的形势。而这些人当时讲话却又多数是信口开河，没有讲稿，更没有收入档案。因此，各家“文革”组织报刊的刊登，成为保存的主要形式。在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成员时，常常可以看到有关的取证。

三是刊登“派性斗争”和武斗的消息、文章。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文革”组织都分裂为几大派，如北京有“天派、地派”，四川有“八二六派、反到底派”，广西有“联指派、四二二派”，江苏有“好派、屁派”等等，各自在自己的报刊上刊登攻击对方的文章，指责对方是“保守派”。一些“文革”组织的分裂，导致了原有报刊的分裂。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之外，又出版有“兵团414派”办的《井冈山报》，名称一字之差，却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发展到最激烈的7、8、9月，各报报导最多的是武斗“血案”、“惨案”，其中当然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煽动对立情绪，但较多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革”造成的灾难。如著名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四川泸州武斗、西安未央路武斗等等，在报刊中都可找到详细的叙述，虽然在细节上由于偏见不完全准确，但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反面教材也有一定价值。

四是刊登“路线斗争”的历史资料。在造反过程中，一些“文革”组织从“走资派”家中或是机要部门抄得了不少机密文件和档案，如过去没有公开的毛泽东内部讲话、中央内部文件等等，予以刊登，有些被编写进反映历史问题的“路线斗争”史。其中最著名的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和地质学院《东方红报》分别连载几十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后来曾经出版单行本。这些内部档案的披露，使外国研究者不仅了解到“文革”时期的资料，而且接触到建国以来历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成为他们研究中共党史的重大突破口。例如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著作中，就广泛地参考和引用了“文革”组织报刊的这部份内容。

五是本派“文革”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分析讨论形势的意见等等。前者一般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往往是空话连篇。后者却有不少深刻反映社会思潮的代表作，如遇罗克等人办的《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出身论》，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实际上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建国以来阶级关系的反思。再如1967年被许多“文革”组织报刊转载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公然提出反对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求进行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是当时极左思潮的顶峰。因而遭到中央的严厉批判和禁止。

这些报刊是“文革”的产物，又推动“文革”走向失控，因而当权者对其态度也基本上经历了鼓励、限制，到禁止的变化。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首先肯定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后针对一些严重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应该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社论进行宣传。二、毛泽东、林彪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中央内部文件、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编印流传。三、报刊上不得发表反对解放军的文章和报导。四、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报刊泄密相当严重，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及经济、外交、机要方面的重要机密，必须迅速制止。五、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六、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中央方针进行。七、不要传播“马路新闻”、政治谣言。

就在《意见》发出一周后的5月22日，发生了一场风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一名外国记者向海外发出了“二月提纲”的全文，陈伯达、江青批示：“要追查，这是盗窃机密文件。”“建议赶走这个记者”。经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调查，记者所发电内容抄自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小报，赶走记者的理由不充份，此事作罢。

由此可见，“文革”组织报刊产生的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不安。然而，这个《意见》既然首先对这些报刊予以肯定，提出的又是“改进意见”，就决定了这种状况不可能改变，根本原因还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内乱”。

毛泽东在运动初期曾肯定了“文革”组织报刊的作用，并用其了解和指导社会动向。1967年6月，他会见外宾提到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报》时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他还当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面，严厉批评了“文革”组织报刊上刊登的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百丑图》，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7月至9月，毛泽东对华北、中南、华东地区进行了视察。出发前一天，他对从湖南来汇报武斗动乱的老同学周世钊谈起了湖南形势。周十分惊讶毛非常了解长沙武斗情况。毛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他又说：工人和学生都是革命的，两派必须联合起来。在视察沿途，他还从各地“文革”组织报刊上了解到武斗分裂情况，从而发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厉害冲突，没有必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4）

据此，中央发出了要求各“文革”组织回本单位实现大联合的通知。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布告，要求外地来京人员不许在北京设立联络站，出版报纸。社会上流散状态的“文革”组织报刊开始急剧减少，继续存在的多是有较大影响的各单位造反组织报刊，一般在内部发行。1968年7月，随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红卫兵开始上山下乡和毕业分配，“文革”组织报刊逐渐走向衰亡，大多数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中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工代会机关报，“文革”组织报刊的出版历史基本结束，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办的《工人造反报》是个特例。



以后，在上山下乡中，也有些知识青年办有《广阔天地》、《自修大学》等报刊，但或者是合法宣传品，或者是非法地下流传，不属于“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性质。

#### ◇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运作与特例

办报理论：一般报刊都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但新闻单位的群众组织报刊如新华社“新华公社”的《新华战报》、“革联”的《新闻战线》，“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的《新闻战报》，《光明日报》的《光明战报》等，则有些专论。《新闻战报》第19期（1967年9月28日）刊载文章《赞红卫兵报》，堪称代表作。文章提出：红卫兵报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认为初期红卫兵运动的传单、小字报，“就是红卫兵报的雏形”；红卫兵报的功劳，是使“被扣押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毛主席的指示”及“文革”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登出来了，并且刊登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的各种讲话和事迹；另一个功劳就是“大批判”。文章认为，红卫兵没有学过“新闻学”，也不懂什么“五要素”、“八要素”，但是他们的报纸“坚持了最彻底的群众路线。十几年来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报导者和实践者相脱离的现象，在红卫兵报上被彻底克服”。文章还批判了所谓新闻“客观公正”论，认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科学的’”。尽管文章把“革命性”作为红卫兵报的生命力所在，但实际上这些报刊吸引读者的地方，主要是违反当权者要求，刊登了大量的所谓被“扣押”的有关指示、内部讲话和文件，比正式报刊披露了很多信息，也即通常所说的“新闻性”。

编辑技术：在当时政治环境中，也带有其特殊的色彩。由于任何一个文字错误都可能带来上纲上线的攻击，因此当时的“文革”组织报刊的错字率都很低，甚至低于现在的通俗报刊。《新华战报》曾批判对立面的《新闻战线》，开列的“罪状”有：刊登刘少奇会见赫鲁晓夫的照片时，保留了在场的康生的部份头像；在勃列日涅夫的照片上没有打叉；刊登毛泽东的指示放在末页位置，等等，都被指责为“用心何其毒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办报者心态。

办报经费：“文革”初期通常作法是逼迫“走资派”签字发给购买纸张费用，作为“革命行动”，印刷、油墨等费用一般都无须支付，只要给印刷工人准备简单的用餐即可。待到出版若干期后，尽管报纸定价较低（通常八开四版为0.02元），但因为没有纸张、工资、稿酬等成本，一般都能有相当赢利。所以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虽然作出规定“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但较大的报刊已不存在经费问题，甚至有的办报者获利颇丰，中饱私囊。

印刷排版：“文革”初期，当群众组织势力不大时，印刷是个大问题，如《首都红卫兵》第一期无处给印，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原《大公报》）排版，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主办者“三司”名声显赫时，这些问题当然就不存在了。使用纸张，较大的报刊一般都是用新闻纸，也有少数用能搞到的各种杂色纸。颜色一般是单色，报头套红。字体一般用铅字排印，也有出版专业的报刊如《美术战报》、《地图战报》用照相制版，比较精美。版面一般是八开四版和四开四版。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唐德刚曾经以很多“文革”组织报刊中有繁体字而认为是台湾等地后人伪造，这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致。“文革”前国务院虽然已经陆续公布了几批简化字，但限于经济条件，多数基层地区旧有的繁体铅字暂时未能全部替代，所以在“文革”组织报刊中常常混用。报纸印数，一般都在几千份左右，故多用平板机印刷，只有北京五大造反组织等报刊发行量在万份以上的才用当时较先进的滚筒印刷机。

流通发行：“文革”初期，一些著名的群众组织报刊曾通过邮局订阅发行。全面动乱以后，邮局也分裂为几大派，拒绝发行对立面的报刊，于是各报刊主要采取邮购和零售方式。在武斗

严重的地区，有的群众组织还出动“文攻武卫”队保护发行。各大城市都形成了自发的集散地。如北京形成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百货大楼门前和西单商场门前几大零售市场，后来发展成为交换市场，许多市民和外地来京者用自己的多余报纸互相交换。一些抢手的报纸甚至出现了高价出售的情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此曾发布告禁止“投机倒把”。一般说来，售报者主要是各报刊本组织的成员“义务劳动”，并不重视赢利，有时卖不出去就索性当传单赠送。为了扩大影响，一些报刊往往押解本单位的著名“牛鬼蛇神”上街卖报。如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都曾被勒令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广场卖报。乔觉得这样“有失国体”，想了个对付办法，待到押解他的造反派刚走，就把小报往地上一放溜走，然后用自己的钱冒充报款上缴，还要多出几角钱，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此事传到毛泽东耳中，1973年4月他还特地为乔冠华的一首打油诗改写了后两句，全诗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5〕

影响最大的“文革”组织报刊：是《首都红卫兵》、《中学文革报》、《工人造反报》。

《首都红卫兵》创办于1966年9月13日，当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宣传部”主办。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毛泽东看到后，感到这篇文章有助于控制越来越趋向分裂的“文革”组织，于是在标题上划上红圈，要求各大报立即转载。2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一齐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引用毛泽东的批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首都红卫兵》开始声名大振，执笔社论的一个大学生也被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此后《人民日报》又四次转载该报文章：1967年2月12日《夺头脑里“私”字的权》、1967年2月20日《必须充份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1967年8月29日《坚决做解放军的可靠后备力量》、1967年9月13日《红卫兵要在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也先后转载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等报刊的文章，但数量不能和《首都红卫兵》相比。

“三司”由此在外地成为中央文革的代言人，纷纷开设驻某地联络站，发号施令。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1月底，“三司”在外地的42个城市设立了联络站，《首都红卫兵》办有上海、重庆、西宁、株洲、长沙、无锡、常州等分刊。在北京还办有中学中专版。其发行总量，估计在50—100万份，是北京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革”组织报刊。

1967年2月22日，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因为“三司”是核心，故《首都红卫兵》也就成为“红代会”机关报。不久大学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首都红卫兵》也分裂为两种，出现另创刊的“红一号”，各地分刊也独立行事，出现了分刊批判本刊，本刊宣布分刊非法的混乱状况。

《中学文革报》同样是北京和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命运却和《首都红卫兵》截然不同。

1966年底，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看到失学青年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十分赞赏。他向学校借贷500元，联系1201工厂印刷，于1967年1月18日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出版了《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全文刊登了《出身论》。报纸出版后，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许多群众组织报刊围绕《出身论》的观点展开了大辩论，多数予以严厉批判。《中学文革报》又陆续刊登《谈“纯”》等文章进行反驳。

《出身论》开篇指出：“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经过统计和分析，针对当时盛行的血统论，尖锐地呼吁：“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

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篇文章大胆提出的观点，对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严重扭曲对立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造反。其所提出的从实践中检验好坏的论点，实际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前的民间探索。它虽然利用了“文革”组织报刊的形式，却是当时从实质上否定“文革”的唯一一份报刊，因而一方面受到群众的欢迎，一方面必然遭到打击和迫害。1967年4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此后遇罗克和办报者都受到残酷迫害。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判处死刑杀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遇罗克无罪。〔6〕

《中学文革报》到1967年4月1日共出版了6期，每期印数在3万到6万之间。载有《出身论》的第一期还出版特刊重印，前后共发行10万份，都销售一空。至今，这份报纸仍然是收藏者眼中的珍品。

上海《工人造反报》是出版时间最长的群众组织报刊。该报从创刊之始，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御用工具。1966年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工总司”代表，提醒他们注意抓舆论阵地。王洪文等人便于12月28日创办了《工人造反报》，张春桥看了创刊号，要求他们“办得泼辣，敢于讲话”，“造反报火力可以强一些，不然的话，要这样的报纸干什么？有些文章《文汇报》不能登，造反报、红卫兵报可以登，火力要超过《文汇报》。出一期报纸要使有些人睡不着觉。别人不敢讲的，造反报你们要大胆讲。”这家报纸名为群众组织报刊，实际上被上海“官方”直接操纵，重要稿件都由“康办”（康平路办公室，上海市委及张、姚在上海办公地点）审阅，报纸负责人经常出席“康办”会议，使该报与当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合称上海“三报一刊”，媲美于北京中央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工人造反报》的许多社论是与上海“三报一刊”合写的，不少被张春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转载，影响很大。

该报发行量最初为3万份，1969年增加到平均每期4.1万份，最多一期达到6.4万份，远远超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该报还出版了大量的“学习材料”，被各地竞相翻印。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群众组织报刊先后停刊，只有《工人造反报》坚持出版，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便以此为榜样，要求复刊。1971年4月，张春桥不得已指示《工人造反报》停刊，前后共出版488期。〔7〕

#### ◇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收藏与研究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收藏，实际从“文革”中即已开始。从1967年1月27日到8月2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通讯社都多次刊登启事，“希望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大力协助，及时把你们办的报纸及刊物每期寄送十份”。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资料部当时也曾经发出类似通知，并派人每周一次到各主要报刊编辑部或交换站索取。所谓交换站，即是与现在的机要交换站类似的机构，在数个比较权威或地理位置便利的群众组织所在地，设若干口袋或格架，各报刊有固定的位置，每次将自己的报刊插入各格，并取走别家赠送的报刊。以北京为例，清华、北大等北京五大造反组织、煤炭部、北京三中、北京师大一附中等，是当时交换比较广泛的内部集散地。

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员的沉浮，这些“文革”群众组织报刊至今仍集中存留在个人手中的已不多见，主要保存于专门的图书档案部门。据笔者所知，目前世界上收藏最多的四家单位是：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其中北京地区占有两家。

各家中，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部所藏种数、期数最为浩繁，共有报刊2611种、66790期，其中北京地区的有315种、5864期。已制成缩微胶卷，由于资料内容特殊，尚不能公开借阅。北京大学图书馆据说有1700多种。此外，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共中央组织部图书馆也收藏有相当数量。后者以藏有毛泽东曾经阅读、批注过的报刊独具特色。

进入9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民间收藏蔚为风气。“文革”组织报刊以其特殊历史背景而备受集报者欢迎，收藏者众多，各地集报协会中都有专门收藏此类者。但由于特殊政治内容，不能进入拍卖市场，流通渠道主要是民间文化旧货市场，如北京潘家园、郑州古玩城等地摊市场是比较集中的场所，出售者主要是走街串户的废品收购小贩，从收购的废报刊中挑选出来到地摊出售。由于来源日少，目前价格不断上涨，普通每份在5—10元，创刊号每份高达几十元不等。

研究者目前主要是境外学者，尤以美国为最。

美国政府情报机构自1966年开始搜集“文革”群众组织报刊，途径主要是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过境旅客等，采取现金收买的方式，每份高达8美元。这些报刊被制成缩微胶卷，聘用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仔细的研究分类，最多时达60多人。不久，这批近万张缩微胶卷作为学术资料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968年起又整批赠送给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并拨款50万美元资助其公开影印出版。从1975年起，出版了20卷《红卫兵资料》，共1064种、10343页，成为70至80年代西方研究“文革”的原始资料，美国各主要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此外，比较详细的目录还有美国国外广播新闻中心编辑《特别备忘录：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说明》及《联合研究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李洪永著《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等。

90年代，一批在美国各大学毕业的中国“老三届”学生先后在美国大学任教或担任图书馆负责人，有感于《红卫兵资料》的远不全面和影印质量较差，决定以自行集资的方式继续进行搜索和整理。自1995年起，由美国狄金森学院、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的华人学者开始主持，通过网络向全世界的研究者、收藏家征集“文革”报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计划在3—5年内，以《新编红卫兵资料》的形式，仍由“中国资料研究中心”等机构出版100卷。其中北京地区将包括936种，三分之一以上是一份不差的整套报刊；全国共3000种、10000份以上。

美国之外，据笔者所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室乌索夫教授著有专著；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编有《红卫兵报总目1—5》（主编加加美光行，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有《红卫兵新闻》目录缩微胶卷；日本早稻田大学文革资料研究会出版有《红卫兵报掲載纸别索引》（主编罇泽彰夫）；香港友联研究所编有《红卫兵资料目录》；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沈迈克教授长期搜集并著有研究论文，还举办了红卫兵报刊展览。此外，据介绍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前，东欧一些学者也有研究。

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曾经这样评价“文革”组织报刊说：“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内情的全部材料几乎都是由为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发表的，这些组织在1966—1967年间曾遍布整个中国。其中一些是在红卫兵小报上定期发表的，还有一些则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他认为，“红卫兵材料的可信性是大大打了问号的，但如果慎重使用，仍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依据”。这也

是比较中肯的判断。但是，他认为，“中国自己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显然寥寥无几”。这当然是因为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和保管而不为外人所知所致。据笔者所知，国内发表过研究成果的学者，仅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印红标等几人。

由于“文革”时期群众组织报刊的特殊政治内容，不可能也不应该形成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毕竟是历史的特殊产物，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具有一定的价值。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存在着怎样荒谬的“文化”与“革命”。

注释：

〔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79年编。

〔2〕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部藏红卫兵报刊登录卡片：1966年8月1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已办有《快报》第三期。疑为传单性质。

〔3〕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第28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4〕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21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章含之等著：《我与乔冠华》，第4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廖公子”指当时在日本访问的廖承志，“韩大哥”指当时在美国进行谈判的韩叙。

〔6〕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2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7〕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第134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

【痛定思痛】

“文化大革命”拾零

• 韦君宜 •

〔韦君宜老人上月逝世，本刊过去曾刊载她的《思痛录》中有关文革的若干章节。本期刊载其第九章，以表示悼念。——编者〕

（上）我这个走资派

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更多的人把这场噩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也有点像噩梦，像见鬼。

在共产党内生活得时间稍早的人，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场“革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吴晗的《海瑞罢官》遭批判，已经使人觉得实在奇怪。后来又批起三家村，批起《燕山夜话》来，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找着。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世人都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那几天，我正在安阳农村里搞“四清”。突然接到电报，命令全队回京。那时别人都还是欢欢喜喜的，在火车上计议作“四清”汇报，写一个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挑战书——这种方式是大家搞惯了的东西。只有我不同，前两天我已经在村里听到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广播。舞的这个剑，意在彭真，已经明白。杨述（作者丈夫——编者）与彭真、邓拓的关系，难以隐藏。何况他已事先来信，说形势不好。所以，我是准备着一回家就先听这些噩耗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连噩耗都没有来得及让我听。车到北京站，我一抬眼已经看见，来“欢迎”的不是像寒假回来时那样的一群人，而是只有人事科的两个人，见了我两眼直瞪，看都不看一眼，接着就喊：“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提行李。来接的不是坐人的汽车，而是大卡车。我们这些老年人只得自己背着行李爬上卡车。人群中只有文学所的叶水夫向我点头握手为礼。在其他所有人眼中，我已经成了等外之民——只下车这五分钟，人就由天上跌到地下。

接着是把我们弄回机关，我一抬眼就看见了要求把我“揪回来”的大字报，又接着是宣布送往社会主义学院的黑帮名单，把我们这一批人马不停蹄地送往黑帮集中处。

这几年，对于这种弯腰挂牌、开会游街……的场面，已经有许多人写文记叙过。反正那一套就是变得人都不认识人了，真是像做梦。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从我的黑帮生活开始记录：

这个黑帮窝也够可怕的。楼上楼下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扭八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邵荃麟病重不能出来见人，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因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加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之后，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我们这些人，本来互相都认识的，这时忽然都变得素不相识了，见面连个头都不点了。

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孟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孟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

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有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搜我，使我深有感慨，在此当领导数年，现却已成囚犯！

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被轮流叫出去开会挨骂，没有轮到的时候就每人坐在一个小课桌旁写交代。

我当然是第一个挨斗的，而且挨斗最多、规模最大。开全社大会，叫我交代：“交代你跟杨述一起到邓拓家搞的什么阴谋！”我答：“没有阴谋，我是去组稿。”底下便拍案大叫：“不老实！说你的反党阴谋！”都是这类毫不讲理的叫骂。机关原单位已全部取消，改由造反组织来领导。科长以上的人都失去了领导资格。当领导的一个是汽车司机高××，还有炊事员张××，清扫工高×，几个青年大学生因为历史简单，也得厕身其中。天天早上，由张××领导我们念认罪书：“我是一个犯了很大罪恶的人……”还要背，背不出的由张××狠骂一通。

这种日批夜斗的奇怪生活，家家一样。我也不想去详细描写。有一段，我是精神失常了。人家问我话，我答不出来，只是眼睛瞪着对方。若说我是疯了，我觉得我头脑清楚，明明是在这里挨斗，是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罪，使我无法逃于天地之间；若说我没有疯，我又和这些所有的“正常人”，已经没有一句共同语言了。我怎能回答他们的话？我只能看着他们，他们好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在一位老保姆（也即一个正常人）的看护下，逐渐恢复。其实那成天批斗我的正常人，倒是不正常的。

街上烧饼店老板都被打成走资派，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旧报纸包花生米的小贩打成反动分子……都不必细说了。还说我自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本旧图片册，不知是院子里哪一家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带到我家来玩扔下的。只见大红封面有个寿字，打开来那玻璃纸扉页上有个小孩子用铅笔瞎涂的带胡子的美人，再往下看，这美人原来是宋美龄。这册子是一本庆祝蒋介石生辰的画册，头一页是蒋宋二人画像，后面是一些山水画（大约是蒋氏家乡写生）。我看了看，扔在一边了。我那位婶娘杨奉筠把它收了起来。事隔多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奉筠此时已不和我住在一起，她竟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本画册里有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国民党吗？家藏国民党的画像，不就是反共罪行吗？于是她找了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两人在公园里好像研究反革命秘密似的碰了一回头。当时杨述正在挨斗期间，对赵贵芳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赵贵芳便把它用包袱包好，送还给杨奉筠。杨奉筠一见，更吓得不知罪有多大。她把这事件报告了我社的造反派，说我私藏蒋宋照片。同时，因为害怕，她又将这画册撕碎毁掉了。这一来，一群年轻的造反派可找到了一件特务间谍案，说我是特务，那本画册是我的特务活动证件。

这实在太荒唐了，我不能糊涂承认。于是我费工夫写了近万字说明，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么厚重（一尺长，二寸厚）的一个本子，特务们会不会公然把它交给我这个已经当了共产党员干部的“特务”？如果给特务们都分发这种大册子做证件，那恐怕得开办特务发行部了。如果不是他们公开发的，那只能说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晋察冀的，一人一个挎包。我在挎包里装上这个特务证件，首先背不动，即使我把别的都不要了，光背着它，那不是走一天就会被别人发现的吗？那时夜晚都睡十几人的火炕，可没有单间旅馆。

这些理由，我一面说，一面想笑。为这个打成特务，自然可悲，但这种理由，怎不比滑稽剧还滑稽？最后他们虽然闹了半天，还是说不过我，才算了。把这一案归了杨奉筠，大概弄到1976年才结案。

其实很简单，我还记得画册的出版处就是杭州美专。为蒋的生日，出一本以风景为主的画册，有什么奇怪？可能刘海粟、林风眠都会知道。但是我可不敢再拉扯别的人了。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在谈论美术作品时闹笑话，还不足为奇。最奇是在文学工作中滚了多年的知识分子老编辑，也写出种种绝世奇文，简直变成了文盲。记得我们有一位被“揪出来”的文友龙世辉，平常喜欢写点寓言。有一篇寓言叫《白鹤的故事》，大约是说白鹤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的作品不如普通的鸟儿。审查我们的造反派，说他这篇寓言是反党，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这就批斗起来。他矢口否认，于是造反派居然在批斗会上亮出了“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是从新华书店业务员嘴里问出来的。她们说：“单行本的《毛著》是白皮，红标题黑字，一大排摆在书店书架上，只见白皮上露出红冠，就是有点像有红顶的白鹤的样子。”于是，这就成了“铁证如山”，那几本白皮单行本成了“物证”。这话听了就叫人匪夷所思，但是，那时候都成了定成反党大罪的根据。

还有一件更有名的文字狱，罪状是我的。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若干岁寿诞，各出版社都必须重印几本他老人家的著作。但是，印《毛著》本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独家买卖，别家要出，只可另行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编了一本《毛泽东论文艺》（其他社也编《毛泽东论军事》《毛泽东论农业》等）。但是，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本已编入选集，印数又大，在这范围内再炒陈饭，实难指望卖出。于是书店提出印数1万（以前已印了好几万），我未加思索就同意了。谁想到这批两个字“同意”，竟成了我“反党反毛”的险恶行径。光靠炊事员、司机写不来批判文章，于是由一位老编辑就此事大作文章，说得我居心殆不可问。怎么能对于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毛著》，只让印1万？怎么能对于全国文艺界迫切需要学习的《毛泽东论文艺》加以限制，不让他们学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他大约根本不记得只在两年多以前，我亲自去跑《毛主席诗词》一书，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厂看清样，以备天亮送到毛主席手里。那本书印了几十万，好像一百万吧。可是，这都无所谓。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己写出这样的奇文，自己署名登报，也不怕丢人。

还有一篇批判“反资文学”的文章，叫我现在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它到底怎么说的。最初，是宣传部长陆定一布置：我们老是反封反帝，这不够。好像资本主义在中国专做好事。不对！也应该出几本书反一反资产阶级。我们按他说的布置，勉强出了三本，完全为了完成任务。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定一先倒了。于是他的一切话都成了反革命言论，他提倡的“反资文学”，也就变成了“拥资”、“美资”的“资产阶级吹鼓手文学”。这理由究竟从何说起？因为当时我就听不懂，只有糊涂认罪，所以到现在也想不出那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实在奇妙。

不能说别人的逻辑怎样糊涂，自己实在也够瞧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天天“上班”，任务除了扫厕所擦地之外，还要天天写交代。有的是外单位来调查别人情况的，尚可按题回答。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例如我交代的，就有我的父母抽鸦片烟。我父亲做铁路局长，盖了房子，一定是贪污。我九妹和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十妹常和住香港的姐夫联系，她们一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如此给自己一家大戴帽子，还算轻的。我本人在旧社会确实只是一个学生，无帽可戴。记得翻译家孙用，年龄较大，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这可就不得了。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与特务有关。可怜那孙用，生平在群众面前讷于言语，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

实在没有得说了，就从思想、文化、作品上来“挖”。原主管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郑效洵说：“毛主席说我们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外国死人部。那我搞的外国文学部就是外国死人部。”这话使我触类旁通。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

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从此，我就天天手不绝书，在那里认罪。我还悄悄看过别人的认罪书，例如郑效洵的，就比我的还厉害，他骂高尔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高尔基也骂，他大概是想开了。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

我那洋洋十万言的“作品”，后来没有全还给我，不知被造反派弄哪儿去了，但是也必然如此。我们全体罪犯约达七十人，平均即按每人每天200字计，一天也要交上去14万字。而管制我们的造反派多数是炊事员、司机们，还有一群初试自己文笔的大学生，一天哪里看得完这14万字？所以，后来写来写去，我也知道了这些根本没有读者，写不写两可。懒得写，我就闭目养一会儿神，再看看别位难友的表情，或木然，或庄严，或悲，或笑，倒也有点意思。

到9月底，国庆节前两天，打发我们到湖北咸宁干校去劳动。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一门课的学校。直到这时，一般革命群众跟我们一起下干校，他们才有点明白自己跟随造反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还认为是下去革命的，也不知道此去的前途是不准回来，等于流放。

我们到达了咸宁一块湖区，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先盖房。我们社（改名为连）的全体妇女集中住在老乡的牛棚里，满屋牛粪味。工作首先是自己和泥做砖盖房，钉竹条搭棚做仓库，准备将来把湖里的水放干了种稻子，自己取名为“向阳湖”。我记得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大家倒也挺有点新鲜劲的。一个女秘书，干完了一天活，回来发表感想说：“我这才觉得我这个人一天干了活，不是白吃饭。以前我们成天干什么了？”她大概觉得自己的半生就是白吃饭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编辑，手持利斧，踏着竹条做的架子，凌空大步砍竹头，脸上毫无惧色。我的任务是和舒芜一起挖一个坑，修建临时厕所。我们两人累得大汗淋漓，才挖好了，欣赏欣赏，边也修光了。但是，一会儿上级传来命令，厕所要挖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只得搬家，还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凭吊了一番。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上边歪歪嘴，下边跑断腿”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干，真的拼命干。一般的群众，在大家差不多的环境下，不再那样歧视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但是，仍然有一些自视身份比别人高的人，用语言和表情来伤害别人，以为娱乐。我记得的，研究鲁迅的杨霁云（也是鲁迅的朋友），因为素无干力气活的习惯，铲土只能一次小半铲，就被我们连队那位首先解放的首任指导员取了一个绰号，叫“二两半”。然后，在一次大会上，由取绰号者向人提出讥笑的疑问：“还有这么一位‘二两半’，真把那点儿土算计得准，为什么非得二两半，再多铲半两，来个三两，就一定不行？”我没有看杨霁云先生的脸，因为这时候我不忍去看。他有什么罪？大概就是早年认识鲁迅的罪吧？而这时正是把鲁迅捧成毛主席以下第二大神的时候。

我们拼命干，多么希望得到人家一点点称赞，至少是同情。哪怕是来自非革命群众的。我记得有一次挖土，我是牛鬼蛇神们的临时组长。诗人陈迹冬也是向无多少劳动习惯的，这时他却一铲一堆，一铲一堆，一连许多铲，头上流着汗。我轻轻无意地说了一句：“陈迹冬今天干得不坏啊。”只见他脸上突现不好意思的谦虚之状，擦了一把汗，像小孩得到大人夸奖似的说：“不过……不过还是有点疲劳啊！”其实，我并未想到这句话在这时能给他以安慰，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容易得到安慰和满足的啊，而所得却如此吝啬……

我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开始时，每次劳动间歇就“开斗争会”，毫无目的地乱骂一通。后来，大约由于这样的“斗争”实在妨碍群众的休息，才取消掉了。平时，我挑不动砖时就用胸顶着上。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

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来呀！韦君宜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地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后来，日久天长，劳动成了每个人的本份，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受苦了——除了太累的时候以外。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融融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大玻璃窗下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

第二年我们要秋收，用大量的稻草，在湖田中心搭了一个休息棚。那里又凉快，又四面来风，旁边连（中华书局）的“战友”们走过，跷着手指说：“真是文学出版社的杜甫草堂啊！”

类此草棚闲话，只要我们把当时身受的政治待遇忘掉，也未尝不可以怡情悦性，物我两忘。后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不久，我就热烈地投入为别人重审结论，实即平反的工作之中了。还有好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都使劲东奔西跑“内查外调”，以推翻造反派给人定下的部份（只是部份）冤案。我把我参加的几个案子都写进小说里。有一篇名为《功罪之间》，那时真是对于自己是功是罪并没有完全弄清的。我原以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便是功，那么别人未参加革命便是罪。如此看历史，如此看世界，究竟功孰罪孰？现在感到，至少要把眼光放得稍大点吧。这是后话。

（下）这些人的罪行

我们这些走资派被斗数年，翻来覆去，无非是工作中那点事情，还基本上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封资修”，反什么呀？反旧剧，反古代和现代文学，反上大学……一般老百姓真也找不出我们什么罪过来斗了。谁反对共产党？许多人没法，就从历史上去找反过共的人。说来说去，把历史上曾与国民党稍有瓜葛的人都拉出来斗，很有意思。凡历史上确查不出认识一个国民党的人，都“解放”较早，而沾一点国民党的，就拉扯不休，以致最后不是斗“走资派”，而是斗的所谓“国民党”、“叛徒”，斗得很热闹了。罪最大的刘少奇，被说成在长沙时代就抱着什么“四书”当叛徒出了狱，在满洲省委已叛变咬出多少人——当然全是胡说。可是骂得比他的“封资修”罪行还厉害。元帅中挨斗最苦的是贺龙，以至于不给水喝，只好喝屋檐滴下的水，加给他的罪名是那一回跟国民党私通了。我们文艺界死得最苦的莫过田汉、邵荃麟，全都被捏造为投降过国民党。邵荃麟病倒不能大小便，干在裤子上，他们也不准医治一下。各个单位造反派照方炮制，都大抓“叛徒”。我们单位也照样。我略举一些我单位内部的人为例：

一个许觉民，被说成叛徒。理由是他请假离桂林到上海后，没找到关系，跟几个同志改换招牌，自己挣几个钱维持生活书店，遂被定为“奸商”并“反党”。一个王士菁，中学毕业时按国民党规章履行过入三青团手续，这自然是反动党团员混入我党内。还有个蒋路，罪名也一样。一个黄爱，因在《毛泽东选集》上胡画胡批过，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个赵少侯，在日本统治时参加过新民会，是老牌汉奸。牛汉原来就是胡风分子，又加上当学生时参加过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混入革命内部。向云休在重庆参加过妇女指导委员会，原系国民党组织，又加入什么“一六九”，不知何团体，肯定应定为特务。程代熙曾在孔令俊（孔二小姐）单位做职员，显然系国民党嫡系反革命。谢恩洁作为共青团员曾被捕，后又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这就是叛徒。刘岚山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五台山集中营，出来时被列名于“劝共党青年脱党书”，当然是叛徒。程穗曾参加过国民党区分部任监察员，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特务。刘敏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两面村长，这就是日本一面的汉奸。萧乾本系老右派，罪恶重重，还加上叛徒。陆耿圣这个老

党员也是假的，因为她在被日本拘捕时写过一句“我是良民”，即是叛徒。丁玉坤是公勤人员，因在国民党时当过警察，也是反动党团。马义民的罪状类似。董恒山原是个京剧小生演员，过去在旧社会混的时候，曾参加过民社党，以便混碗饭吃，这一次就打成了反动党团成员。冯雪峰本来早打成右派兼“封资修”还不够，这时又拉出他在上饶时被国民党捏造登报的姓名，指为叛徒。周汝昌抗战结束国民党部队回到天津时，曾参加欢迎，写了篇《箪壶迎师记》，自然成了反动党派的奴才。陆浮在南洋被人诬指为出卖，后来公安部已经平反，造反派却仍按老账算。黄肃秋因姓名雷同被弄错，后来已弄清，也还要说那错案是对的……诸如此类，记不胜记。包括我，也差一点给算到叛徒里面。因为1938年我受党派遣去襄阳，后我外祖父前往襄阳，把我叫回武汉。这时造反派们查得我离襄期间凑巧与我一起工作的刘同志被捕了，他们就说是我出卖的。我不肯屈服，举出证据，刘同志被捕时我早已离襄到武汉，那晚上台儿庄大捷游行，还碰见过张光年、于光远二人，可以作证。我的辩解才算起了作用。

这种干法，哪个人都能胡拉乱扯两句。除了这大批“叛徒”之外，还有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张健无罪，只因查出婆家是地主，便被揪出。郭凤兰只因丈夫自己拿钱办了个缝纫学校，便夫妻俩一同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杨立平只因丈夫重病不能教书，回父母家养病，而父母是地主，就此打成“异己分子”……数一数，仅我一社，只要解放前在20岁上的人，如此揪出的竟达半数，还没有数完。

这是为什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为什么打了这许多不相干的人？而且其中主要的，如刘少奇、贺龙案，都是毛主席过问的吧？这事情我想出了一点门道。大致，毛主席所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是封资修；可是，首先我国人民与封建关系很密，说反封，实际上反不了。不让唱京戏，不让学古代文学，已经反不下去，再多的更说不清。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一定要反，不知道反什么才对。要不，就不上大学吧，不念外国书吧，不穿漂亮衣服吧，小姑娘都穿上军服……别的就不太清楚了。毛主席再三号召反，群众只好想：大概要反的就是反共的，一切与共产党不一气的。群众不太了解什么资产阶级文化，却知道人必须听共产党的，而且在五六十年前就得人人早有觉悟，紧跟共产党，不紧跟不行。什么历史背景，大家不懂。那就拼命打反共的，由此造成了这么多的叛徒、反共党团、阶级异己分子。有些命运不佳挨了整的人，只好哀叹自己命不济。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这话使人思之失笑。反对走资派，本来是为了搞思想，闹了半天，群众还觉得思想问题并不甚重要。换言之，反对资本主义，不走资产阶级道路，在群众头脑里，并不占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连什么《红灯记》《芦荡火种》《海港》等等，不是也只知反叛徒，未见哪个戏深入讨论一番反对走资派的重要性吗？

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用此眼光看文学作品，就看不出应当重视的作品来。这是题外话。

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整个社会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

连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听说在讲“成份”，也说：“从前给闺女找主，自己再穷，都得想法找家里有两间房子二亩地的，谁把闺女给老花子（京话叫化子）去？”于是审查来审查去，才逐步把老头、老太太们“解放”了。而事实上，革命群众在干校所受的待遇，也与被打成反革命的相差并不太远。同样下田劳动，同样不许回北京，同样要把家属接到干校去。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日渐低落。

跟我们一起下来的不少“革命群众”，渐渐由于自己身受的待遇而有点觉悟。但是仍有人一

定想从别人身上找出“反革命”来，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那一年，从北京忽然传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政治传闻。这个组织名称既奇，其组织目标也怪，谁也说不清。只传说是“为了反革命的”，那么反了革命之后要干什么呢？谁也说不出来。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证据罪行，什么也没有。也是一个个上台去坦白交代：“我参加了反动的‘五一六’。”还说有介绍人、有宣誓、有上级，描写得和共产党的组织一样。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有半夜里打的，打得附近老百姓都来提出抗议。有三天不准睡觉（审讯人轮流睡觉），逼问口供的，逼得那个“五一六”头昏眼花，头上一滴水掉下来，竟以为是要拉出去砍头，跳起来就大叫。这个人就是造反派里边写文章批判我印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陈×。“原来你也有今日！”一开始我心里觉得痛快。但是不久我就看到，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走进无底深渊。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齿冷。后来，在我已经被“解放”当了连指导员之后，上级叫我仔细审查这些“五一六”案。当时“五一六”最大的“黑窝”实际上是造反派最大的黑窝，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联队”。杨述就是被他们那里的吴××“揪”出来的。这时，我们单位的一些人，要我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清查“五一六”案。我已初步看了一些材料，一看便知那些“资料”全是捏造的，张三和李四对不上，根本不值一顾。我当然不能说这不值得查，也不愿趁此时机向那些造反派报复，只能说这里不能分身，推诿了，没有去。

这“五一六”的案子又是从何而起的呢？也可以分析一下。这基本上是一些年龄较轻，揪不出多少历史问题的人。我们单位的“五一六”全体都是大学生。为什么要揪他们？因为想揪出更多的罪犯，想揪出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找不到什么思想根据，于是创造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五一六”组织。竟然也风靡一时，害苦了多少年轻的干部，乱闹了一场，最后结果全是假的。这番“革命”，当然不会不引起这些“五一六”的深思。觉得冤枉，觉得糊里糊涂响应“大革命”号召，原来是上了一回当。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另一个“五一六”在全体会上流了泪，表示自己过去乱打老干部是完全错误的，向全体老同志道歉。

年老的走资派和叛徒，年轻些的“五一六”，结果都是如此。那最年轻的，最早动手打人的学生们呢？他们一开始是到处挨门挨户斗争，被学生打死者，听说甚多，我不能统计。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云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一个。大学校长知道高芸生被逼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时竟成了凶神恶煞，无人敢惹。开口闭口：“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更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反正学校里念的都是，都不要。于是，先是把学校一律改名“抗大”，每日只出门造反，在家斗老师，不再上课。后来学校一律关门，学生们全国去跑。然后大学“恢复”了，要高小毕业生去升大学，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不必赘述。只说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种地去了。书，就是你想读也不让读了。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未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还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军队干部。这些人中的一部份，一开始就当军宣队，后来又当各级领导，可谓一直走红运，受崇拜了，但是后来也因林彪的垮台，而垮台。北京却仍然长时期以军队统治我们文化部门，但是到最后也结束了。这一段留待后面再讲吧。

□ 摘自《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